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历史主义^{*}

王日华◎

【内容提要】 历史主义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理论范式之一，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 世纪中后期，学术界围绕“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研究进行了一场持久而激烈的学术论战。通过这场学术争论，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及其研究纲领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和发展。在本体论上，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理解和解释当代或未来国际关系本质的基础；在认识论上，历史主义坚持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将国际关系实践纳入历史进程中来观察；在方法论上，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研究法的重要性。中国有着数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实践，中华民族有着浩瀚的文化积淀，中国历史的发展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结合历史实践、历史文化和历史方法的研究是中国学者最鲜明的理论特色。

【关键词】 历史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 理论特色

【作者简介】 王日华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电子信箱：wrihua@163.com

历史主义影响了整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心理学、建筑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历史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范式之一。迈克尔·

^{*} 感谢阎学通教授对本文所给的重要修改建议，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建议，感谢所有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帮助的老师 and 同学。文中不当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唐兰 (Michael Donelan) 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五大类: 现实主义、信仰主义、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厚古主义和历史主义—进步主义。^① 而大卫·布彻 (David Boucher) 则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三类: 以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人为代表的经验现实主义; 以西塞罗、托马斯·阿奎纳、康德、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全球道德秩序传统主义和以卢梭、伯克、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为代表的历史理性传统主义。^② 尽管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无处不在, 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始终没有对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建构。中国有着数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实践和文化积淀, 历史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 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那么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主旨和结构是什么呢? 本文试图梳理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主义的学术争论, 并以此提出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结构和理论主旨。

一 历史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在英文中, 历史主义原本有 “historism” 和 “historicism” 之分, 分别代表了历史主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卡·波普尔 (Karl R. Popper) 创造了 “historicism” 一词并经克罗齐 (B. Croce) 大力推广后逐渐成为英语世界的通用语。^③ 近代以来, 历史主义的影响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成为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理论范式之一, 在 20 世纪前后它缔造了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 “历史主义时代”。^④ 限于篇幅, 下面将重点梳理会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领域和历史学领域的历史主义研究。

① Michael Donela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7.

② David Boucher, *Polit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1.

③ Karl R.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61).

④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Blackwell, 1955), p. 2.

（一）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伪历史主义”^①和“非历史主义”^②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20世纪60年代，国内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学术论战。^③尽管学者们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历史主义与辩证法、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主义与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对历史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内涵有着许多共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物质的观点，历史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人可以在主观上认识或接近认识这种客观发展规律；（2）运动的观点，一切事物都是历史性的存在，都处在永恒的发展过程之中；（3）进步的观点，历史发展呈现一种上升的、前进的趋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4）联系的观点，历史发展是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的；（5）时代的观点，任何事物都处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具有时代特性和个性。^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2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606页。

③ 吕振羽：《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问题的争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2期，第1—10页；谢本书：《“历史主义”问题论争述评》，《贵州文史丛刊》1984年第3期，第5—16页；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第304—323页；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④ 宁可：《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第1—26页；宁可：《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第1—37页；关锋、林聿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第1—18页；朱永嘉等：《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及其运用——和宁可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63年第12期，第1—17、45页；牛致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观点的问题——与宁可同志商榷》，《文史哲》1965年第4期，第72—79页；许永璋：《试论有关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4期，第1—12页；许永璋：《再论历史主义》，《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第30—37页；蒋大春：《关于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第25—35页；奚介凡：《关于历史主义若干问题的商榷》，《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2期，第115—121页；李振宏：《论历史主义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第62—74、79页；林甘泉：《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深入探讨有助于厘清历史主义的基本哲学内涵。毫无疑问,哲学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影响了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引还不足以把历史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区分开。列宁指出,马克思“吸收并进一步发展 19 世纪初那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经济主义和历史主义(以及辩证法)”。^① 因此,要想全面把握历史主义,就必须追溯历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 历史主义、历史哲学与国际关系理论

19 世纪过后,历史主义在欧洲思想界批判和反思理性主义中逐步发展壮大,经过黑格尔(G. W. F. Hegel)等人的承接和发展,到了兰克(Leopold von Ranke)时期,历史主义盛极一时,几乎支配了整个西方史学界。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研究了历史主义的起源,对莱布尼茨(Leibniz)、伏尔泰(Voltai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休谟(Hume)、吉本(Gibbon)、赫尔德(Herder)、歌德(Goethe)等人的历史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梅尼克认为:“历史主义的核心是用个体化的观察来代替对历史——人类力量的普遍化的观察。”^② 黄进兴研究了 18 世纪以来历史主义的起源、发展、危机和变迁,系统介绍了西方历史主义史学思想。^③

在西方史学思想中,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1) 强调经验主义的作用,反对历史学的系统研究方法;(2) 强调特殊性和个别性的重要性,反对寻找历史的规律性和共性;(3) 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真相,注重第一手资料的运用;(4) 强调研究过去的历史,致力于认识和理解过去的经历。

历史哲学领域的历史主义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 51 页。

②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前言第 2 页。

③ 黄进兴:《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 1—82 页。

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也成为科学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排斥历史主义的重要依据之一，即国际关系理论寻找普遍规律的努力与历史研究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

（三）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与国际关系理论

在科学哲学领域，库恩（Kuhn）首先倡导和建立了历史主义学派，之后，拉卡托斯（Lakatos）、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夏皮尔（Shapere）、劳丹（Laudan）等人继承和发展了库恩的历史主义。

库恩将历史哲学领域的历史主义思想移植到科学史研究中来，将科学发现视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首先，历史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用编年史的手法将科学发展描述为积累，而是强调进化与发展的整体进程。库恩将其划分为“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等阶段；^①而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进化和退化”的发展阶段。^②其次，历史主义在对科学标准的界定上与波普尔的“反历史主义”展开了多次论战，在波普尔看来，历史主义是特指“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途径，它认为历史预言是它的主要目的，并认为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的‘节奏’、‘类型’、‘规律’和‘趋势’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③有鉴于此，中国学者在翻译波普尔的“历史主义”时，一般都直接将其翻译为“历史决定论”。最后，历史主义明确将科学发展与科学史包括外部历史、内部历史联系起来，强调科学发展与其他知识、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

科学哲学领域的历史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最为深远，尤其是科学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明确提出“非历史主义”。同时，历史主义的研究

^①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② Imre Lakatos,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③ 卡·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第46—47页。

内核却更加深刻地嵌入了国际关系理论之中,这种矛盾再次提醒我们,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任何片面地理解历史主义的做法都会带来无法解释的理论困惑,这就需要我们全面理解历史主义的内涵。

德怀特·李 (Dwight E. Lee) 和罗伯特·贝克 (Robert N. Beck) 回顾了历史主义的五种定义: (1) 通过历史进行解释或评价; (2) 生活的历史化; (3) 哲学的历史化; (4) 历史相关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 (5) 历史预言。李和贝克认为,历史相关主义、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决定论都是对历史主义的片面认识或误解,历史主义的真正内涵主要包括两条:一方面,历史主义是一种信念,即任何东西的真实性、意义以及价值;另一方面,历史主义是一种反实证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观点,即历史知识是理解和评价人类当下政治的、社会的以及人类理智处境与问题的基本或唯一要求。^① 李和贝克的界定已经基本上澄清了历史主义的轮廓,但是仍旧没能厘清历史主义的界限。卡尔文·兰德 (Calvin G. Rand) 进一步指出,历史主义的两大基本内涵就是作为世界观的历史主义和作为方法论的历史主义。^② 黄进兴将历史主义区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极限,“即相信历史知识为人类活动最重要的指标,借助历史人类可以评价、了解生活的一切,因此社会与个人的经验皆可规范到历史领域来;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性质可由其历史发展的过程来掌握,任何事物的价值可由本身的历史来判断”。^③ 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认识论,我们就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上梳理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二 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范式,它首先是综合的,包括一个科学群体所共有

① Dwight E. Lee and Robert N. Beck, "The Meaning of 'Historic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9, No. 3, Apr., 1954, pp. 568 - 577.

② Calvin G. Rand, "Two Meanings of Historicism in the Writings of Dilthey, Troeltsch and Meinecke," *Journal of History of Ideas*, Vol. 25, No. 4, Oct. /Dec., 1964, pp. 503 - 518.

③ 黄进兴:《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第 7 页。

的全部承诺；其次则是把其中特别重要的承诺抽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要想把握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具体内涵，只要把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公认的某些特别重要的承诺列举出来即可。范式本身也是一种哲学，是一组启迪智慧的问题及其回答，这些问题大致包括：“宇宙是由什么样的基本实体构成的？这些基本实体是怎样彼此相互作用的？这些基本实体又是怎样与感官相互作用的？对这些实体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合理的，以及在寻求问题解答中使用什么样的技术？”^① 概括地说，我们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来理解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涵和结构。

（一）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

在哲学中，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反映到历史主义中就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之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有着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历史唯心主义则认为历史是由人的观念创造并且由书写者记录下来的历史，某些历史人物和历史的书写者的观念塑造了历史。在历史唯心主义看来，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②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本体论二分法反映到国际关系理论中，对应的就是物质主义（materialism）和理念主义（Idealism）。

物质主义强调国际关系及其基本特征的物质属性并以此作为理论的起点。现实主义将权力和利益作为解释源，权力和利益是可以量化计算出来的。例如，摩根索认为国家权力主要包括九个方面：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工业生产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民族特性、国家士气、外交素质、政府素质。^③ 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认为尽管决定国家权力的要素很多，但是对国家权力构成决定性影响的要素主要有六个：地理要素、自

①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4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2页。

③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p. 127—169.

然资源、人口、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国民士气。^① 克莱因 (Ray S. Cline) 认为, 决定国家权力的要素包括人口、领土面积、收入、能源、矿产、工业、粮食、贸易、军事、战略和意志等。^② 中国学者黄硕风把综合国力分为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七个方面。^③ 尽管这些权力要素中包含民族特性、社会素质、政体素质、外交素质、政府素质、国民士气、战略和意志等社会要素或观念要素, 但是在物质主义者看来, 这些社会和观念要素都可以物质化并进行量化测量。国家利益可以区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军事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等类别, 也可以根据重要性不同而区分为核心利益、关键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等。国家利益和权力一样, 可以物质化并能够测量出最终的绝对收益或相对收益。新自由主义增加了国际机制的解释源, 但是仍将国际机制建立在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上, 国际机制仍可以物质化为国家的制度性权力或软权力, 从而在本质上也属于物质主义的范畴。

理念主义都将观念、知识或信念等视为国际关系的解释源, 强调人和社会对观念的建构作用。解构主义 (或者被称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 是一种较为彻底的理念主义, 它们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了解构, “国家” “权力” “无政府状态” “利益” “主权” “霸权” “国际机制” 等概念在解构主义看来都需要进行再次阅读。^④ 解构主义认为这些概念基本上是空洞化和泛化的观念, 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 国家关系学需要研究的是国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

①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pp. 124 - 189.

② Ray S. Cline, *World Power Assessment: A Calculus of Strategic Drif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5); Ray S. Cline, *World Power Trend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1980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0).

③ 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 兼论新中国综合国力》,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第 12—13 页。

④ James Der Derian, *Antidiplomacy: Spies, Terror, Speed, and War*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2); Richard K. Ashley, “Untying the Sovereign State: A Double Reading of the Anarchy Problematic,” *Mille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2, No. 2, Jun., 1988, pp. 227 - 262.

解构主义认为国家间关系实质上应该是“文本间关系”。^①

在国际关系领域，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之间的对立并非是绝对的。建构主义理论中部分流派接受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而部分流派则坚持解构主义的基本立场。^② 被称为温和建构主义的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将国际政治的最根本要素归结为国际体系中的“观念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但是温特将自己划入“弱式物质主义”的阵营，理由是观念通过建构物质性的权力和利益而起作用。^③ 温特希望自己能够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创造出不同于哲学二分论非此即彼的第三条道路或者说中间道路。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温特的辩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物质第一性还是观念第一性正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标准，除非人们在国际关系领域建立以二分论以外例如二元论为基础的理论。

在围绕结构主义的争论中，华尔兹坚持物质结构主义，“他从系统的排列原则、单元的特定功能和单元间的能力分配三个方面来界定结构概念。在国际关系中，国际政治结构也就是无政府状态、该领域的秩序原则以及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状况”。^④ 温特同样坚持结构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立场，但是温特认为，根据观念分配原理，结构可以区分为三种不同的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新自由制度主义接受了华尔兹的结构概念，但是增加了国际制度要素，强调结构之外的进程，或者说非结构动机、交流和合作能力的变化。^⑤ 罗伯特·考克斯综合了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一个物质和理念合二为一的结

①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eds.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9).

② 郑深：《建构主义：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演变》，《集美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36—40页。

③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95.

④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9 - 101.

⑤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New York: Longman, 2001), p. 281.

构主义,或者说结构主义二元论:“一个结构中有三个相互作用的力量范畴(表现为潜在可能性):物质力量、观念和制度。”^①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结构只是“一个纯粹和简单的描述”,它使每个存在保留了严格的个体性,并且既不表述这一存在所属于的图表,也不表述围绕这一存在的邻近区域,也不表述这一存在所占据的位置。^②

(二) 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

在哲学中,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是:人的思维能否认识世界以及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对第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可以区分为可知论和怀疑论。在历史主义范式内部,也同样有可知论和怀疑论。历史可知论认为历史进程是可知的,人的主观认识可以无限接近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就是说,未来是可以预测的;历史怀疑论则认为历史是不可知的,“我们在这上,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③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在哲学上可以区分为反映论和先验论。历史主义是一种反映论者,接近经验主义,认为借助历史经验就可以认识世界。然而,在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上,在历史主义范式内部,则出现了历史循环论、历史终结论和历史进化论等迥然不同的观点。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也同样包含着两个基本的问题:其一是理论能否认识历史;其二是理论怎样认识历史,或者说在理论中历史是怎样的?在这里,历史指的是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进程。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绝大部分理论范式是可知论者,都认为理论能够理解或解释历史或历史进程,否则理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理解和解释分

①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1, pp. 126 - 155.

②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183页。

③ 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60页。

别对应规范理论和因果理论，但是一些解构主义者看来，文化文本本身是一种真实的幻觉或者文字游戏。拉康就把无省略法则和无系统化法则作为分析经验的两条基本原则。^① 约瑟夫·奈表示：“另一个教训就是要意识到历史学家的选择性。没有人能够叙述一历史事件的全部内容。”^② 在通往认识客体的道路上，实在论认为历史独立于主体之外，历史不依赖于主体的存在而存在，但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建立对历史的理解或解释的理论。建构主义者批评了结构主义理论的抽象主义，认为其忽略了历史的过程、实践、权力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基础以及政治历史。但是，建构主义者又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其理论中无不夹杂着主体的价值观。“知识并非产生于主体对于客体的中立观察，而是反映了此前既已存在的社会目标和利益。”^③ 温特一方面强调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坚持认为，权力、利益、无政府状态等概念只不过是社会建构的结果^④。

对历史进程的认识，机械论者强调结构对施动者独立的决定性作用；而人本论者则认为施动者的主观活动影响甚至决定了结构。循环论者认为，国际体系及其结构甚至国家行为总是在某种模型范围内循环往复；进化论者则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国际关系的本质处在不断的进化之中。

华尔兹和吉尔平均强调历史的恒定性。华尔兹表示：“尽管边界、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经济和军事行为等所有这些都发生了改变，但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和模式却明显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更远一些看看例如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或者印度的考提拉亚时期的各种类型政治实体间完全的自由竞争，其本质和模式特征都是一致的。”^⑤ 吉尔平表示：“我们当前的研究采

① 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76页。

②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3rd (New York: Longman, 2000), p. 18.

③ Andrew Linklater, “The Achievement of Critical Theory,”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79.

④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51.

⑤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pp. 329–330.

取另一个非常不同的立场,即建立在数千年来国际关系的基本属性没有变化这一假设的基础上,国际关系始终延续着在无政府状态下独立实体间围绕财富和权力而反复斗争。”^①然而,华尔兹和吉尔平在历史主义上的区别是:前者的理论在于“揭示了政治结构是如何解释一些反复出现的国家行为特征和某种反复的和持久的模型”。^②而后者则通过行为体对“成本—收益”比的核算,国家改变国际体系的对外政策目标是提高国家的整体利益。^③由此可见,将华尔兹列入“静止现实主义”的行列是有争议的。华尔兹和吉尔平都承认国际体系或结构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历史进程的变化,但是二者都将这种变化限定在某种静止的体系或结构之内。“华尔兹变革”实际上指的是可能存在的单极、两极或多极体系之间的转换;而“吉尔平变革”则是均衡—失衡—均衡之间的循环。因此,现实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历史循环论者,也正是基于历史循环和国家行为反复性的假设,现实主义者认为可以根据历史来预测未来。也就是说,历史总是会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以某种极其类似的方式重现。华尔兹表示:“只要行为体和组织机构是与武力和竞争相伴,而不是权威和法律,那么我们就能够预期去发现这些行为和结果。”^④

作为进程理论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均强调进化。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经济进程、世界总体权力结构、各种问题领域内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组织影响下的权力等四个方面都能解释国际机制的变迁,但是解释国际机制的变迁更需要综合运用这四种理论。^⑤温特一方面承认文化的进化属性,认为国际体系沿着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不断进化,大约在 17 世纪时期,欧洲率先从霍布斯文化进化到了洛克文化,而从 20 世纪

①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7.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6 – 117.

③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50.

④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7.

⑤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p. 18 – 30.

后期开始,国际体系已经开始向康德文化进化的历程。^①然而,康德没有进一步解释国际体系的进化是否始终停留在仅有的三种结构循环中,抑或是会发展出新的体系结构。当然,华尔兹也并非完全否认进化,在华尔兹看来,国际结构的进化是在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之间的进化,国际社会一旦进化到等级制,也就意味着国际关系的终结而超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接受范围。不过,在但丁、康德、康有为、福山等人看来,国际社会的进化最终会出现世界帝国、世界联邦或者是单一的大同社会、民主社会。马克思主义也认为阶级斗争的结果必然导致单一的无产阶级世界或者说社会主义世界的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被认作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的约瑟夫·奈则常常摇摆于历史恒定论和历史进化论之间。一方面,奈强调,自修昔底德迄今,国际政治中的某些方面仍然保持着同一性;另一方面,奈又承认,“国际政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约瑟夫·奈提醒国际关系研究者要借鉴历史以理解延续性与变迁性,而不应为过去所束缚”。^②

(三) 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的方法论

方法论的基本问题是主体是怎样认识和改造客体的。一般来说,历史主义方法是相对于科学行为主义方法而言的。科学行为主义认为科学的研究必须运用抽象概念作为分析工具,遵循某种科学的研究程序,最终形成一个具有普世性的永恒命题。科学行为主义倾向借鉴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或者说“硬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演绎和推理来建构理论。历史主义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和差异,坚持以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为基础,倾向定性研究和归纳研究。然而,历史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历史主义方法是一个方法群,其本身包含的具体方法如下:

^①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314.

^②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p. 2.

(1) 历史文献分析法。历史文献分析法强调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历史资料,通过对这些历史资料的分析来重现历史的真实面目。

(2) 历史案例研究法。历史案例研究法指的是学者通过对独特历史事件的研究,进而归纳或总结出某些历史规律,并将其上升到一般层次,作为普遍的历史规律或理论命题。

(3) 历史比较法。历史比较法希望通过比较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期的历史,或对长时段历史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试图寻找出比较对象之间的异同点,进而将这些异同点发展为普遍性或特殊性的理论命题。

(4) 历史哲学或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即研究“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学者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批判性研究,提出对未来世界或理想世界的规范性建议。

(5) 历史定量研究法。从总体上来说,历史主义更加倾向定性研究法和归纳法,但是历史主义方法并不排斥定量研究法和演绎法。历史定量研究法就是指通过对历史进行定量统计以及科学的统计分析来获得一般性的命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主义无论是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方法论层面上,都是一个开放的空间,随着这三个层面上不断涌现的问题及其不同回答,历史主义在基本内涵上也会不断充实和丰富。上述解释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历史主义者的共有观念,但是已经为我们研究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框架。

三 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论战

20 世纪中期,随着结构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的发展,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围绕“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出现了一场持久的学术论战。结构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者主张建立“去历史化”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历史主义者则强烈批评结构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者的“非历史”缺陷。分歧与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去历史化”与建立独立性国际关系学科的努力

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之初，国际关系学者为了寻求学科的“独立性”，他们会特别强调国际关系学与历史学的差异，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区别开来，要求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去历史化”。^①一般来说，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被归入社会科学的领域。历史学家专注历史考据和历史解释，而国际关系学者则更加重视当代研究，同时也在努力对未来进行预测。在处理历史实践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对国际关系学者随意摆弄历史材料的做法极其不满，他们认为任何不加考证地使用历史材料都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行为。历史学家并非不需要理论，但是无法忍受国际关系学领域层出不穷的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研究中，历史实践是根据需要而选取的素材，除此之外，不需要考虑这些素材的来龙去脉和历史传承。杰克·列维（Jack S. Levy）详细列举了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学者之间的差异：历史学家常常抱怨国际关系理论家误用历史，而国际关系理论家则经常抱怨历史学家的非理论路径；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受到不同类型的研究训练，侧重不同的方法论问题，对特定第一手资料赋予不同的价值，发表在不同的期刊上，对学者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大多面对着不同的学科兴趣；历史学家描述、说明和解释单个事件或一系列以时间为基础的事件，而政治科学则是将变量和结构之间的关系归纳为社会行为的规律性命题；历史学家描述和说明一系列事件之

^① John Lewis Gaddis, "Expanding the Data Base: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Enrichment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1, Summer, 1987, pp. 3 - 21; Gordon Craig, "The Historia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8, No. 1, February, 1983, pp. 1 - 11;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1); Ian S. Lustick, "History,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 Multipl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Problem of Selection Bia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No. 3 (Sept., 1996), pp. 605 - 618; Edward Ingram, "The Wonderland of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53 - 63.

间的联系,而政治学家则建立或检验关于变量或一类事件之间关系的普遍性理论陈述。^①

(二) “非历史主义”理论及其批评者

肯尼思·华尔兹 (Kenneth Waltz) 的结构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的正式分离。华尔兹认为理论和历史不同,“尽管理论与它试图解释的世界相关,但理论却总是停留在世界之外。‘现实’既不会与理论一致,也不会与理论所代表的模型一致”。^② 历史本身也是一种“现实”,但是华尔兹认为从“历史现实”中只能产生历史法则,而不会衍生出理论。他表示:“理论在于解释历史法则,而不是历史法则的堆砌。理论和历史法则有着本质区别,历史法则阐明恒定不变或可能存在的联系,而理论则展示为什么会存在这些联系。”^③ 在结构主义看来,“理论可以定义为一种符号结构,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假设,其中包含了定义、法则、定理和公理等”。^④ 菲利普斯·夏夫利 (W. Phillips Shively) 将是否接受假设前提作为区分现代科学与前科学的主要依据,“前者有一组普遍接受的假设前提,许多理论都是从这组假设前提推论出来的”。^⑤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将“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前提假定,并且认为这一假定是恒定不变的,贯穿于整个国际关系史的始终。在此基础上,华尔兹提出,国际关系的基本类型和行为规范就

① Jack S. Levy, “Too Important to Leave to the Other: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22–33.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p. 9–10.

③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5.

④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5th ed. (New York: Longman, 2001), p. 23.

⑤ W. 菲利普斯·夏夫利:《政治科学研究方法》,新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90页。

会出现高度的相似和循环,从而使得理论可以与“历史”脱离开来。华尔兹表示:“国际政治的结构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模型重现,事件无止境地重复。国际政治永恒的无政府特征导致了数千年来国际生活本质的显著同一性。”^①

结构现实主义的“非历史”倾向很快就遭到了学者的批评。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K. Ashley)认为:“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在进程、实践、权力和政治等四个历史的维度上沉默无语。”^② 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 Cox)也表示: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肯尼思·华尔兹等人将现实主义改造成了某种形式的问题解决理论,他们本人饱读史书,但是倾向于运用表现问题解决理论特征的行动框架,采取了静止的、非历史的观点,尽管新现实主义使用的材料来源于历史,但是其思维模式却停留在历史之外。^③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普遍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单位。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创造主权国家的最后因素”。^④ 于是,1648年就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对西方理论的“非历史主义”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多数国际关系学理论都被无意识地锁定在相对狭窄的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范围之内”,从而无形中穿上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⑤

然而,华尔兹却对这些围绕现实主义“非历史观”的指责不以为然,华尔兹回应说:“将历史排除在问题解决理论之外并不妨碍政治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66.

② Richard K.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2, Spring, 1984, p. 258.

③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0, No. 2, Jun. 1981, p. 131.

④ 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五版),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第50页。

⑤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中文版序言第1页。

学的历史研究,谁又能怎样将历史关联到我所创建的理论类型里面去呢?”^①

(三) 科学行为主义与历史主义之争

科学行为主义和历史主义之争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有名的学术论战之一。历史主义坚持采用传统的历史方法来发展理论;而科学行为主义则强调应该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方法”来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科学行为主义特别推崇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统计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C. Snyder)等人利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外交决策理论;^②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借鉴数学和控制论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体化理论;^③莫顿·卡普兰(Morton A. Kaplan)借鉴生物学方法研究了国际体系的变迁;^④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借鉴数学和博弈论的方法研究了国际冲突和谈判战略;^⑤辛格和斯莫尔(Melvin Small)等人则借鉴统计学方法展开了“战争相关性”(COW, The Correlates of War)项目的研究。^⑥

①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39.

② Richard C. Snyder, et al.,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③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④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7).

⑤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⑥ J. David Singer, ed., *The Correlates of War, Vol. I, II, Research Origins and Rational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J. David Singer and Paul F. Diehl, ed., *Measuring the Correlates of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J. 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 *The Wages of War, 1816-1965: A Statistical Handbook*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2); Melvin Small and J. David Singer, *Resort to Arms: International and Civil Wars, 1816-1980*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2); J. David Singer and Richard J. Stoll, ed.,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in World Politics: Timely Assurance and Early Warning* (New York: Praeger, 1984).

科学行为主义力图根据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来解释研究的现象；而历史主义则希望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理解现象的意义。科学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相对应的是解释性理论，解释性理论的基础是寻求把若干主题统一起来，寻求理解人类行为的原因，以及发现支配人们或集体（包括国家、联合体或同盟）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规律；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相对应的是诠释性理论或者说理解性理论，理解意味着经验和诠释，例如重大事件的当事人是如何看待当时的情况的。^① 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等人表示，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把对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研究与国际历史研究区别开来。^② 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现实主义者的‘科学假设’：现实是历史进化的整个进程。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调查和揭示这一进程的规律。历史进程之外不存在现实”。^③

莫顿·卡普兰借鉴生物学和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实验室，是检验国际关系理论的大熔炉，而国际关系理论的建立则需要从历史中抽象出来。卡普兰表示，要想建立国际关系理论，“就需要使用分析工具将国际行为的材料从传记或历史情境中系统地抽象出来，然后把它们组成一个由恒定命题构成的统一整体”。^④ 然而，在历史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负责的人类社会研究。

在卡尔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中，他特别强调历史归纳法的运用，卡尔表示：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首先需要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归类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⑤ 然而，在华尔兹看来，这种历史主义的归纳法和经验的逻辑无法建构理论，理论已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直觉经验。因为统

①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p. 23.

② 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第27页。

③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第65页。

④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3.

⑤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第5页。

计是无穷无尽的, 归纳总是不完整的; 而经验常常误导我们。 “除了描述性内容外, 理论还包含着理论观, 理论不可能仅仅通过归纳来建构, 因为理论观只能被发明而不能被发现。”^①

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之争不仅没有加深二者之间的分歧和裂痕, 相反, 通过这场学术论战, 双方都开始正视对方, 开始意识到相互倚重和开展综合性研究的必要性。于是, 这场论战的结果促进了历史与理论的综合研究。

四 国际关系理论: 走向历史与理论的综合

尽管历史与理论一度出现了分歧和裂痕, 但是二者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首先, 在学者身上, 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是明确的历史主义者或者非历史主义者。例如, 汉斯·摩根索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主义者, 但是摩根索首先开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研究方法。摩根索强调在历史的进程研究中国际政治, 并且明确表示: “我和马丁·怀特 (Martin Wight) 的理论轨迹都是历史的, 而正是这种历史轨迹使得我们与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时髦的理论区别开来。”^② 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一方面提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 或者说是国际现象的普遍性规律的现实主义六原则; 另一方面, 他又同时强调这种理论不是先验的和抽象的, 而是经验的和切乎史记的。^③

其次, 科学行为主义强调定量研究, 而历史主义者则多采用定性研究, 但是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科学行为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研究中并不存在天然的界限。历史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理论都重视对历史案例的定量统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5.

② Hans J. Morgenthau, *Truth and Power: Essays of a Decade, 1960 - 1970*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0), p. 252.

③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pp. 4 - 14.

计和分析。对此，达里奥·巴蒂斯特拉（Dario Battistella）进一步区分了定量分析法和形式分析法的不同，他认为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都属于经验主义科学范畴；而形式分析法则与数学或逻辑学一样，是一种非经验主义科学。^① 而波普尔则明确指出，科学行为主义和历史主义根本就不存在对立，历史主义之中同时包含着科学行为主义和非科学行为主义两种方法，一种是承认物理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具有适用性的“亲自然主义的”或者说是“实证的”历史主义；反之则被称为“反自然主义的”或者是“否定的”历史主义。^②

最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学术界更多的声音则是呼吁历史与理论的联姻，强调历史与理论的综合性研究。保罗·施罗德（Paul W. Schroeder）等人研究了历史与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关系，他们发现，即便是宣称要“去历史化”以及被屡屡批判为“非历史主义”的新现实主义，也并没有完全摆脱历史的束缚。^③ 1997年，美国的《国际安全》（夏季号）期刊专门邀请了一批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就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主题研讨，尽管学者们都承认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存在差异，但是都主张不应该因为这种差异将二者完全隔离开来，而历史与理论的结合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施罗德仔细区别了历史经验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那些“适用”的经验才能发展成为理论。^④ 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详细分析了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共同基础，^⑤ 科林·埃尔曼

① 达里奥·巴蒂斯特拉：《国际关系理论》，潘革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61页。

② 卡·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第46页。

③ Paul W.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08 - 148;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Correspondence: History vs. Neo-realism: A Second Loo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p. 182 - 193.

④ Paul W. Schroeder,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ot Use or Abuse, but Fit or Misf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64 - 74.

⑤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Theory, and Common Grou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75 - 85.

(Colin Elman) 等人集中讨论了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特点及其异同, 提出了二者相互借鉴的基本路径。^① 此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冷战的和平结束使得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措手不及, 而首先预测到冷战可能以和平方式结束的学者却是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② 对此, 加迪斯指出, 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应该联起手来, 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指导冷战史的研究以及从中寻找新的国际关系理论。^③

历史与理论之争最终使得历史与国家关系理论的综合性研究成为一种共识并非偶然, 因为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有天然的内在联系, 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从学科发展史上看, 历史学是国际关系学的渊源学科之一。国际关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每当我们追溯国际关系学的起源之时, 都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历史学。斯坦利·霍夫曼 (Stanley Hoffmann) 表示: “确切地说, 我们将我们的学科始祖溯源到修昔底德 (Thucydides), 就像政治学家们将他们的始祖追溯为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一样。但是, 修昔底德是一个历史学家。”^④ 王逸舟也表示, 国际政治学的思想源泉 “首推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及其不朽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⑤ 爱德华·卡尔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历史学家, 专攻苏俄史, 但是卡尔却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形成的标志性人物。卡尔的著作《二十年危机 (1919—1939):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 “很像一部教科书和历史作品”。^⑥ 在肯尼

① Colin Elman, Miriam Fendius Elma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specting Difference and Crossing Boundar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5 – 21; Stephen H. Haber, David M. Kennedy and Stephen D. Krasner, “Brothers under the Ski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34 – 43.

② John L. Gaddis, “How the Cold War Might End,” *The Atlantic*, Vol. 260, Issue 5, Nov., 1987, p. 88 – 100.

③ John L.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Winter, 1992 – 1993, pp. 5 – 58.

④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1.

⑤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第22页。

⑥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 第65页。

思·汤普森 (Kenneth W. Thompson) 列举的 18 位 20 世纪国际思想大师和主要理论家中,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Herbert Butterfield)、爱德华·卡尔、乔治·凯南 (George Kennan)、小路易斯·哈利 (Louis Halle, Jr.)、阿诺德·汤因比 (Arnold Toynbee) 等人首先是历史学家, 其次才是国际关系理论学家。^①

第二, 从研究范围来看, 历史实践尤其是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国际关系学是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 跨学科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的典型特征。^② 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交集就是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宋新宁等人认为, “在中国,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广义地理解包含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和当代国际政治问题三个基本组成部分”。^③ 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的关系, 而国家间的关系自古就有, 因此, 国家间关系和外交的历史实践就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之一, 在怀特看来, 历史是国际关系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全部内容, 这就形成了著名的“国际政治 = 历史阐释”或者“国际政治 = 历史哲学”的公式。^④ 但是在大多数学者眼中, 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焦点之一。^⑤ 国内学者时殷弘等人关注到了历史对国际关系的影响。^⑥ 戴维·辛格 (J. David Singer) 提出将历史实践作为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和路径。^⑦ 然而,

① Kenneth W. Thompson,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Major Twentieth-Century Theorists and the World Crisi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② Tim Dunne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第2页。

④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5), p. 32.

⑤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 第12页。

⑥ 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20—25页;张文木:《历史逻辑与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7—28页;张鸿石:《论历史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47—51页。

⑦ J. David Singer, “The Historical Experiment as a Research Strategy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2, No. 1, Autumn, 1977, pp. 1—22.

并非所有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著作都可以纳入国际关系学领域,只有那些在史学研究中进行了国际关系或外交理论创新的著作才会得到国际关系学的认可。例如,马汉(A. T. Mahan)的《海权在历史上的影响(1660—1783)》通过对海战史的研究提出了海权论;^①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兴衰》通过历史比较提出了大国兴衰的理论;^②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等人的《决策的实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通过对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外交史的研究提出了决策理论。^③ 杰克·列维(Jack S. Levy)强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要加强历史学和政治科学的综合性研究。^④ 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强调在对外政策研究中要加强历史学和政治学之间的相互借鉴及其跨学科研究。^⑤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形成了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⑥ 斯蒂芬·霍布登(Stephen Hobden)等人在多个层面尝试将历史社会学引入国际关系学中,倡导构建新的国际社会学或历史世界社会学。^⑦ 尽管国际关系研究更加关注当代和未来,但是在张鸿石看来,历史的惯性、趋向性、渗透、整合和召唤作用对当代和未来的国际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⑧

① 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 - 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0).

②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or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③ Graham T.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Longman, 1999).

④ Jack S. Levy, "Too Important to Leave to the Other: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22 - 33.

⑤ Alexander L. George, "Knowledge for Statecraft: The Challenge f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44 - 52.

⑥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ker Fox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0).

⑦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⑧ 张鸿石:《论历史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47—51页。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历史研究法是国际关系学的经典研究方法。国际关系学起源于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其最初的研究方法沿袭了历史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时殷弘表示:“以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考察为基干,结合尤以广阔深邃的宏观思考为特征的哲理性思维,就有了所谓国际关系理论化的经典方法。”^①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对国际关系中的经典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介绍。^②一般来说,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方法”或“经典方法”指的是“主要依靠判断、直觉和洞察力,依靠历史知识、甚至是个人的经历,依靠对事物的基本性质的‘质’的一面的深刻感受”。^③例如,兰克的《论列强》^④、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大外交》^⑤、保罗·施罗德(Paul W. Schroeder)的《欧洲政治变迁(1763—1848)》等。^⑥

卡尔被尊为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文献分析法,“卡尔对历史文献分析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史和文献解析,二是历史实例列举”。^⑦摩根索同时采取了经验和逻辑的两种方法,从历史实践中归纳出普遍规律。摩根索的历史主义方法与雷蒙·阿隆的历史社会学以及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更为接近。基辛格继承摩根索的这一研究方法。当然,这种方法同样也可以追溯到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奉为始祖的修昔底德。科学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戴维·辛格倡导将数学和统计学研究方法应用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运用大量的数学公式和

① 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20—25页。

② 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in Klaus Knorr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20—122.

③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65页。

④ 利奥波德·冯·兰克:《论列强(1833)》,吴征宇译,载高全喜编著《大观》(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第307—338页。

⑤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⑥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⑦ 胡宗山:《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83页。

图表来描述了他的“影响理论”。^① 这就使得“其著作和文章中大量运用数学公式和图表, 玄妙得很, 艰涩难懂。在借用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模型学等手段和方法研究国际关系时, 故弄玄虚, 越搞越数理化, 这恐怕也是科学行为主义的一个共同特点”。^② 然而, 辛格等人很快就发现, 如果没有历史的支持, 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程序将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于是, 许多科学行为主义者开始转向历史, 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统计来寻找科学方法的原料,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战争相关性研究”。

第四, 从理论的建构来看, 历史经验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历史经验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来源, 历史经验本身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理论假设, 这些理论假设一旦被证实就可以被称为理论。石斌从思想史的视角提出, 思想本身就是广义的理论; 思想也是历史和理论的中介。^③ 在均势理论和国际体系理论研究中, 学者们更是对历史青睐有加。^④ 吉尔 (B. K. Gills) 提出了从世界史出发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三种方法。^⑤ 怀特表示: “政治学研究的知识经典是政治哲学家; 但国际关系研究中唯一得到承认的经典却是修昔底德和他的一部历史著作。历史著作更多地收录和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以及对外交的重点关注, 而不是国际关系理论或政治理论作品。”^⑥

① J. David Singer, “Inter-Nation Influence: A Formal Model,”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7, No. 2, Jun., 1963, pp. 420 - 430.

②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第 100 页。

③ 石斌:《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史学月刊》2005 年第 6 期, 第 11—14 页。

④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The Idea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y Meets Histor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5, No. 3, Jul., 1994, pp. 231 - 255; Paul W. Schroeder, “Quantitative Studies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An Historian’s Reac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1, No. 1, March 1977, pp. 3 - 22; Paul W. Schroeder,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ystem: Balance of Power or Political Equilibriu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2, April 1989, pp. 135 - 153.

⑤ B. K. Gill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rocesses of World History: Three Approaches,” in Hugh C. Dyer, e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ate of Ar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⑥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p. 31.

总的来说,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指出,国际关系理论开始从历史哲学中独立出来,从理性主义的所谓“规范化研究”向现实主义的“历史—经验研究”过渡。^①经过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传统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历史主义开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向,“在受‘社会科学’支配的漫长而黑暗的冬天期间,寻求传统的历史和哲学思考的温暖”。^②

综合来看,历史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性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但是对于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和阐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首先是没有严格区分历史经验、历史实践和历史方法等,从而混淆了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系,使得学者之间的争论出现了“聋子的对话”,因为他们所定义的历史内涵与范畴不同;其次是没有从学科发展源流上区分历史学、历史哲学和历史社会学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差异,尤其是历史社会学融合了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三个学科,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研究方向;最后是没有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区分历史主义,或者是简单地将历史主义视为其中一个单一的组成部分,例如,很多学者会将历史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历史研究方法甚至是历史决定论。

五 中国学者与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体系内的各个诸侯国、王国和藩属国之间就存在着复杂而频繁的国家间互动,这些国家间的互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而同时代的先哲们也早就对国家间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历史主义赋予了中国学者鲜明的理论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历史实践是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起点和基石。数千年来,在中

①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45页。

② Hedley Bull,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p. 201.

国区域曾经出现了多个大大小小的独立政治实体,这些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中国体系内的国家间关系与外交实践,总结这些历史实践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理论假设,同时也可以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实践和事实检验。秦亚青认为,“儒家文化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实践”是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和实践渊源之一。^① 时殷弘表示:“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这一原理寓于国际关系考察和思索的悠久历史,或曰国际关系考察和思索的悠久传统。”^②

第二,历史文化是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来源。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的先哲们就在思考“天下”范围内的政治治理,这些着眼于“天下”的思考无疑对我们今天探索世界性问题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詹姆斯·多尔蒂(James Dougherty)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 Pfaltzgraff, Jr.)表示,墨子、孟子、孔子和商鞅的著述都在尝试着从理论上阐述国家间关系的本质,^③“从和平主义到和平理论,到好战学说或战争理论,古代中国提出了大量的理论学说”。^④ 费正清(John Fairbank)等人则认为,中国古代甚至还出现了“国际政治学的初级学科”。^⑤

第三,历史方法是中国学者较为熟悉的传统研究方法,同时也是读者最容易接受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国内学者纷纷转而关注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综合性研究。阎学通等人基于中国传统道义思想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秦亚青教授指出:“可以把实证主义、理解学派结合起来。如何结合呢?有一种办法,可以称之为‘融合术’,从历史的大时段中研究国际体系的发展和变革。但是解释历史是什么,就要解释人,人是推动历史

①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第5—9页。

② 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20—25页。

③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p. 8.

④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pp. 195 - 196.

⑤ John K. Fairbank ed., *World Orde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78 - 279.

发展的，把人融合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去，这显然是一种方法。像华尔兹的‘非历史’研究，现在看来局限性确实很大。”^① 王正毅教授则明确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说到底其实是理解、解释国际关系历史以及现实的‘话语’世界的创造。”^② 唐世平也表示：“国际政治理论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解提炼而来的，因此，这种理论的产生脱离不了对历史的理解、抽象归纳、形成假说，然后经过历史的印证和未来的检验最终成为一个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理论一定是‘历史的’。”^③ 在历史学界，也有学者对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分离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李世安发现：“在历史编撰和史学理论研究过程中，不重视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较少收集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少研究国际关系方面的理论。”^④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实践出发是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方向或者突破口，这就需要我们遵循历史主义范式，将中国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中国的历史实践和传统思想在诸多方面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这也成为我们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来源。

近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地将目光转向中国古代历史和思想传统，试图从中发掘国际关系思想的当代价值，开启了中国的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当前，国内的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路径主要有三类。

一是“政治哲学路径”，即从政治哲学层面研究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制度和体系。赵汀阳从制度哲学出发，深入研究了天下理念的理论价值和天下体系的制度内涵。“从理论上讲，天下理念创造了一个容量最大的政治分析框架，一种容量最大的政治知识论，它提供了政治的世界尺度和世界性眼光，同时提供了一套容量最大的政治分析单位。所有的政治问题，无论是世界政治、国际政治还是国家政治，都可以在天下理论的框架

① 秦亚青：《第三种文化：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0页。

② 王正毅：《国际关系理论创造的三个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71页。

③ 唐世平：《国际关系理论的时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44页。

④ 李世安：《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略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02页。

内统一地被分析。”^① 赵汀阳将天下体系视为最理想的世界制度，以此来弥补西方哲学缺乏世界分析单位的缺陷，并将天下体系的基本观念、原则和现代社会的世界治理、国际政治逻辑联系起来。“从理论上说，天下理论改造了政治学/政治哲学的理论结构，超越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分析框架。天下理论增加了‘世界理论/国际理论/本国理论’，并且改变了对政治问题的解释方式，其中，世界理论是基础理论，它支配着国际理论和本国理论的解释。”^② 天下体系作为世界政治制度的概念和命题引起了西方国际关系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③ 支持者认为天下体系是未来世界稳定秩序的希望，反对者则表示这是中国世界帝国梦想的复苏。无论持何种观点，很多西方学者开始将天下体系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的一部分。

二是“外交史路径”，即从中国古代国家间外交史的层面研究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的思想、观念、规则和演变发展史，这一研究路径主要以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及其影响下的青年学者为主，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国际关系思想研究中的“北大路径”或“北大学派”。叶自成教授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国际关系理论的先行者。早在 1994 年叶自成就对国内国际关系学界研究和推崇西方理论提出质疑：“当有些学者在得出地缘政治的理论发源于西方的结论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认真地思考过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古代有没有过地缘政治？远交近攻、连横破纵是否可以称为地缘战略？”^④ 在这期间，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研究基本上还是他“一个人的精彩”，因为国内质疑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存在的观点是主流。叶自成等人一方面通过比较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试图寻找二者的异同点；另一方面还运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框架来解释

①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 120 页。

②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 32 页。

③ 柯岚安：《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徐进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0 期，第 49—56 页；A. 乐比雄：《在时间与历史中寻找跨文化秩序——对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些评论》，陆丁译，《世界哲学》2008 年第 6 期，第 98—109 页。

④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第 6 页。

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及其外交史。^①

三是“思想史路径”，即从中国古代思想史层面研究其中的国际关系思想及其当代理论价值，这一研究路径以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及其影响下的青年学者为主，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国际关系思想研究中的“清华路径”或“清华学派”（The Tsinghua Approach）。阎学通等人希望通过研究先秦国际政治思想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们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先秦国际政治思想研究的初级阶段，就是通过选读先秦文献提炼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感想。他们选取了《管子》《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尚书》《左传》《国语》《四书》《战国策》《吕氏春秋》《武经七书》和《大戴礼记》等先秦典籍进行选译并撰写了国际关系思想导读，提炼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警句。^② 第二个阶段是中级阶段，即通过精读先秦文献提炼相关的国际关系思想并将之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比较。他们研究了管子的霸业思想、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孔子的仁德取天下思想、墨子的集体理性和非攻思想、墨子的仁政治天下思想、荀子的等级秩序思想、韩非子的实力至上思想、《左传》中的国家间干涉思想、《礼记》中的和谐世界思想、《战国策》中的霸权思想、《吕氏春秋》中的战争杂学思想等。^③ 第三个阶段

① 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叶自成等：《华夏主义：华夏体系500年的大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叶自成、庞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24—29页；叶自成、王日华：《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第113—132页；王日华：《历史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先秦中国体系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胡波：《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肇始》，《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50—59页；孙力舟：《西汉时期东亚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分析——基于汉朝与匈奴两大政治行为体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第17—25页；王日华：《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及其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第100—121页；王日华：《国际体系与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第58—68页；王日华：《先秦国家利益论及其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136—154页；王日华：《古代中国体系的基本单位、结构及其特征》，《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44—57页；王日华：《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5期，第47—54页；王日华、漆海霞：《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相关性统计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3—120页。

② 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③ 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是高级阶段,也是理论创新阶段。阎学通比较了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流派的异同,开始提炼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的因果论述,可以说他已经迈出了创建新理论的第一步。^①

当然,政治哲学、思想史和外交史三种研究路径的区分是相对的,很多学者在三者之间游动,综合运用多种研究途径。^② 在历史学领域,也有一些从民族关系史、邦交史、制度史和思想史层面的研究成果,但是大都没有结合国际关系理论框架。^③ 相对而言,一些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国际关系史的过程中能够将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古代史较好地结合。^④

① 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5 期;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1 年第 1 期;Zhang Feng, "The Tsinghua Approach and the Inception of Chines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1, Spr., 2012, pp. 95-96.

② 时殷弘:《帝国的病变、中兴和衰毁——〈汉书〉政治/战略解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1 期,第 142—155 页;时殷弘:《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民族特性/政治文化塑造和“改换天下”大战略进程》,《国际展望》2013 年第 6 期,第 1—12 页;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6 期,第 4—32 页;时殷弘:《从“朝贡和平”到决战决胜:汉初 80 年的帝国对外历程》,《文化纵横》2011 年第 3 期,第 120—123 页;董承婷:《盛唐对外关系及其国际政治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宁雷明:《外交政策分析理论和中国古代外交实践》,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

③ 何茂春等:《中国历代外交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裴默农:《春秋战国外交群星》,重庆出版社,1994;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徐杰令:《春秋邦交思想述论》,《求是学刊》2003 年第 1 期;张云箴:《宋代外交思想研究》,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④ Richard L. Walker, *The Multi-Sta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Hamden: The Shoe String Press, 1953); Chi Lu Chiang, *The Scale of War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2005; Shui-Lung Tsang, *War and Peace in Northern Sung China Violence and Strategy in Flux*, 960-1104 A. D.,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97; Claudio Cioffi-Revilla and David Lai, "War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China, 2700 B. C. to 722 B. C.: Measurement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9, No. 3, Sept., 1995, pp. 467-494; Claudio Cioffi-Revilla and David Lai, "War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China, 2700 B. C. to 722 B. C.: Measurement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9, No. 3, Sept., 1995, pp. 467-494; Gerald Chan, "The Origin of the Interstate System: The Warring States in Ancient China,"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5, No. 1, February, 1999, pp. 147-166; Cho-Yun Hsu, *War and Peace in Ancient China: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nterstat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Asia Program Occasional Paper, Number 75, October 3, 1997.

总之，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如果说科学主义是美国学派的理论特色，社会建构是英国学派的理论特色，那么历史主义就是中国学派的理论特色。毛泽东曾明确表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① 中国学者应扛起历史主义大旗，坚持理论自信 and 理论自觉，担负起建构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任。

六 结论：探寻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的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范式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顺理和研究，大多学者尽管都会用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甚至以历史主义作为主要研究路径，但是很少有学者明确将自己或研究成果纳入历史主义流派中去。

如果我们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母体划分出政治学传统、历史学传统和哲学传统三种主要方法论来源，根据国际关系理论本体论和认识论来比较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作为三大国际关系学的母体，分别带来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基本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中国学者提出的天下主义，都遵循了哲学传统，从哲学层面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包括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和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 534 页。

攻性现实主义、历史主义、世界体系论和地缘政治论等都是以历史视角作为建构理论的起点。以沃尔兹（又译作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和民主和平论等流派，则遵循了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原则。英国学派的理论和学术观点总体而言偏向历史学传统，但是同时融合了历史社会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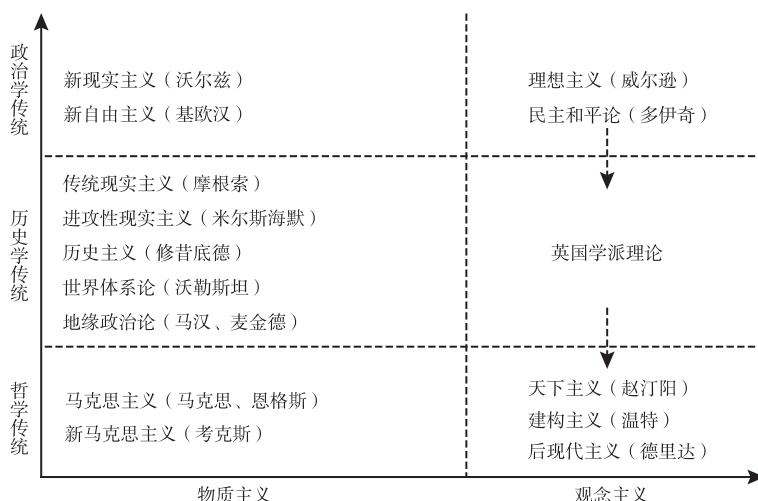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关系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分类

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主义、世界体系论和地缘政治论等流派都强调物质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将物质视为第一性，将所有的分析对象都纳入物质的范畴。其他的理论流派都承认物质的重要性，但是对不同物质要素的偏好和重视程度大不相同。理想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天下主义和英国学派的理论均坚持观念影响的不可忽视性，认为正是不同的观念塑造了不同的行为及其后果，从而导致了国际关系的现状并决定或影响了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将任何一位学者或研究成果贴上理论流派的标

签都是不恰当的，但是知识谱系的梳理和发展的确赋予了他们不同的特征，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我们将历史主义放入国际关系知识谱系中进行分析，仅仅是开展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第一步，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者自觉运用历史主义发展和建构新的理论。